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理念的改革与创新

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从我国7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理念中关于投资的主体、着力点、决策、方式、资源开发、中外之间投资等六个方面的变革和创新, 阐释其中所体现的否定之否定、阶段性扬弃的规律及历程中的曲折与艰辛。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坚定改革创新的恒心,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努力探索、不懈改革、发展前行。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理念; 改革创新; 否定之否定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 (2021) 03-0100-07

DOI:10.16444/j.cnki.cn33-1228/d.2021.03.0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事物发展抽象出来的普遍规律。其中包含在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中不断演绎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与潜力。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70余年的历程, 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从长时段的大历史分期还是从同一时期内的中短时段来看, 均具体地、生动地显现这一规律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我国7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六方面理念的变革和创新, 阐释其中所体现的否定之否定、不断变革的规律性。回顾历史有助我们坚定改革创新的恒心,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努力探索、不懈改革、创新发展。

一、投资主体——从公私中外多主体到公有制单一主体再到多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否定了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经济形态。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具体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它的特征是: 以国营经济为领导,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 各得其所”;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政府通过调控市场发挥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作用; 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 实行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注重充分发挥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与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

这一制度使新中国在遭受“封锁、禁运”、抗美援朝战争的困局中, “边打、边稳、边建”从容应对, 创造了三年经济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的奇迹, 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

1956—1980年又被称作计划经济时期。经

[收稿日期] 2021-03-01

[作者简介] 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济体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施了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了个体与私营经济。到1956年底,基本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投资主体相应由多主体变为公有制单一主体。当时,新中国在遭受封锁导致半封闭的状态下启动工业化,只能依靠自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早期获取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唯一途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得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搞工业化。但是这一时期除以陈云为代表的个别领导注意发挥市场作用、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并为解危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在调整中运用市场机制外,总体对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经济运行缺乏灵活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针对“文革”时期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投资主体再次多元,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创新升级。

21世纪以来的投资主体中,科技企业成为重要成员。2020年3月开始,随着新基建浪潮来袭,科技企业各巨头相继登场,尤其以百度、腾讯、阿里与华为(BAHT)为代表,他们凭借在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5G等领域的诸多技术优势,推动数字基建落地,使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快速,规模已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投资主体在多元化的基础上,结构仍在不断变化。

二、投资的优先着力点——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围绕民生有序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工业化的具体路径上,最初有主张按照先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后发展重工业的路径;在农业改造上按照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顺序进行,一方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又有投资少、收益高的优势。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封锁

禁运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面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紧迫要求,中国不得不否定了先发展轻工业的路径,也否定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路径,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以及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发展顺序。正如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因为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也不发展:在广大的国土上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火车头不能自制,钢轨也大部从外国输入;汽车公路通车的在解放前只有七万五千多公里,货运客运汽车为数很少,而且都是从外国输入的;内河航运和海运都不发展,内河只有很少的古老的轮船,几乎完全没有远洋的运输;完全没有自己的航空业。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的运输业还会停留在现在破旧的状态上。轻工业虽然有一些,但是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因为我国没有重工业,许多轻工业的机器,尤其是精密的机器不能制造;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现有的轻工业就会一天一天破旧,而得不到新的装备的补充和改造,要扩大轻工业和建立新的轻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学肥料,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1](p705)}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的二十余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历经艰辛,倍受磨难,大起大落,曲折发展,同时也是艰苦奋斗、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计划制订与实施的不同阶段,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体制、结构、中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同样存在“否定之否定”的局部改革创新。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面对

严峻的困难局面，我国也曾调整，做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战略。但实施时间很短，未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局。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填补了产业、行业的诸多空隙和空白，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方面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突破和飞跃，终于“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

20世纪80年代以后，投资结构逐步调整，重工业投资压缩，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投资增加，非生产性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增加，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投资逐渐得到保证。但是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迅速增加。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6.4亿吨标准煤，是1980年的7.7倍。1990—2017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增加约4.4倍。伴随工业迅猛扩张，主要污染物排放也大量增加。2017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33.2亿吨，比1990年增加了5.7倍^[3]。这种以资源、能源和环境质量损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透支发展质量和效益，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确立了保护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探索绿色转型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确立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投资推动绿色转型，发生历史性变革。

2000年以后，围绕民生有序调整投资的重点与布局才形成长期战略。2018年以后投资的项目发生了一些变化。项目选择的重点更多放在科技引领创新、战略新兴产业布局等领域，比如中芯国际以及之前投资的大疆无人机、赣锋锂业、威马汽车、海尔卡奥斯、京东物流、美团、药明康德这些项目^[4]。特别是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衰落的复杂严峻形势，我国提出“六保、六稳”，进一步明确人民的生命与安

全是投资的第一要义。“新基建”指向基础设施、创新发展，投资的优先着力点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加大新型基础建设的大背景下，面对新基建浪潮来袭，以5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建设，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同时具备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的厂商，拥有了竞争最大筹码。高度重视电子商务发展。特别是2020年以来，电子商务在助力抗击疫情、拉动消费回补、畅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大力发展数字商务、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深化农村电商发展、开展惠民惠企行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六方面，加快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5]。

在面临新冠疫情、国际经济环境大调整的新形势下，大力投资农业，提升农民地位，让农民只在土地上劳作，就有不错的收入、坚实的保障，就能够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使农业快速成长，把饭碗捧在自己手心，全面脱贫奔向小康，成为投资的重要目标^[6]。

三、投资决策主导——由计划决定到市场起基础作用，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世纪50—70年代，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项目审批权高度集中，一切固定资产投资都纳入基本建设计划，建筑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施工力量由国家统一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的专门机构管理。国家得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实施超高强度的积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时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时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从“一五”计划开始，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否定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半封闭状态,实施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外资,开发开放;否定了农村的政社合一、集体经营,实施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定了集体土地统一经营,实施农村土地置换开发,形成地方土地财政,大拆大建,加速城市化进程。

在经济理论界,陆续扬弃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认识,突破了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当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由基础性作用逐渐发展为决定性作用。建立了以中央银行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发展了多种信用工具。证券交易、股份制等多种融资、投资手段推动了投资的市场化运作。

21世纪以来,明确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环境恶化、局部战争、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衰退等百年不遇的新问题面前,政府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了。

四、投资方式——从财政拨款到“拨改贷”“债转股”,再到规范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新中国诞生后,建立了由财政无偿拨款到中央各部分配投资的体制。对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实行投资限额管理的办法,设立了监督管理建设投资的专业银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交通银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设立专门管理基本

建设拨款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银行信贷不允许用于基本建设投资。

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国务院批准了《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拨款改贷款,即人们通称的“拨改贷”,这是国家同企业关系的重大体制改革之一(另一项为“利改税”)。从此,银行信贷介入投资领域,冲破了30年基本建设只能用财政拨款不能使用贷款的禁区,把加速资金周转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上了企业的普遍议事日程。

突破了拨款的桎梏,各类投资信托公司兴起,由贷款演变为投资,并且通过发行债券、引进外资等方式直接投资,形成了“贷改投”,建立投资基金,组建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各个公司独立核算,实行总经理负责制。1998年国家计委、财政部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颁布实行《关于中央级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拨改贷”向“贷改投”转变的相关程序和措施。《办法》中对多个投资主体的地方企业规定了“企业中既有中央级‘拨改贷’资金,又有地方财政安排的地方级‘拨改贷’资金,原则上中央级‘拨改贷’资金转国家资本金时,地方级‘拨改贷’资金也应同时转为地方对企业的投资”,以使国家、地方、企业三者的利益都得到兼顾。

对于“拨改贷”导致的债务纠纷,1994年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既不是将企业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也不是将企业债务一笔勾销,而是将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之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即“债转股”。

然而,正如原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言:“债转股对于债权人、债务人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8]“债转股”演化为“债转债”的担忧一直存在。同时,投资后的管理问题,以及对股市的潜在影响等问题都蕴藏其中。从2016年10月新一轮债转股启动至今,在未来的道路上如何

化解这样的难局，只能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轨道上，完成一场比拼耐力的长跑。2020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纪要明确了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债券持有人自行或者共同提起诉讼等问题，有利于提高债券持有人的维权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规定了债券纠纷案件的受理、管辖与诉讼方式问题，实现案件管辖和审理的相对集中化等。证监会强调，将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工作要求，严厉查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推动加大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显著提升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在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力导双循环的新形势下，股、债、贷“全开”、监管层力拓企业多渠道融资。打造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全方位融资体系，多部门正在推进多项举措，打通股、债、贷多资金通道。股权融资方面，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并购重组改革以及新三板改革；债权融资方面，通过产品和机制设计来解决中小微和民企的融资痛点，增强投资人信心；在信贷融资方面，力促银企对接和贷款审批权限下放，拓宽中小银行资金补充渠道。

五、土地资源开发投资——从“开垦、围垦”到“有水快流”，再到绿色、可持续，再到主动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我国耕地按人口平均相当紧缺。新中国建立头三十年开发耕地资源主要方式是开垦围垦，使荒野和荒漠增产粮食。该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北大荒”被开垦为全国主要粮食产地。开垦初期，北大荒年产量只有0.048亿斤，1978年粮食总产突破50亿斤，1995年突破100亿斤，2005年突破200亿斤，2009年突破300亿斤，2011年突破400亿斤。70年来，北大荒累计生产粮食7411亿斤，累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6060.2亿斤，对于我国由“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转变起了重要作用^[9]。

但是我国多地一度盲目开垦围垦也使环境遭到破坏，沙患水患增加。此后曾经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水快流”做法更使得环境遍体鳞伤。前

者是为了粮食，后者则是为了谋利。但两者都消耗了地球资源，透支了子孙后代的福祉。

我国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提出环境保护，八十年代之后也长期将其作为“基本国策”。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浙江安吉余村调研，在听取当地的发展困惑以及关闭石矿保护生态的做法后，首次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12年以来，在顶层设计的引领下，一场从观念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式开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自此铺展。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注重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着力实现法治化、制度化、科技化。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大国。2019年，我国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3.4%，比上年上升1.3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8年降低4.1%。截至2019年底，全国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4.9%，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10]。

六、中外投资关系——从半封闭到引进来，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直接投资，再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再到“双循环”

新中国建立头30年，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为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上有两个禁区：不允许利用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种引进外资形式。

从引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利用跨国投资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今天我们做贸易有了很大的改变，采取了很多灵活的做法。不久以前，我们在外贸上还有两个‘禁

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的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11]同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这表明，正式突破“两个不允许”的禁区，确立包括引进外国投资的政策在内的对外开放国策，实现了对外经济政策重大转折。

由于逐步放宽了对外资企业的股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外商投资快速增长。至200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东道国。2001—2010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68亿美元增加到1057亿美元，已连续1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企业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索之路。1984年8月20日，陈云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关于钢铁工业建设问题汇报的谈话时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12](p537)}一些长期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专业外贸公司和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验的企业，首先开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设海外代表处或海外贸易公司。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正式列入国家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这标示着中国“走出去”战略正式起步。在“走出去”战略政策法规的支持下，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21世纪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挥中国作用，在合作共赢中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开始改变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西向东传播并处于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特别是进入21世纪20年代，开始以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为抓手加快高水平开放，随之在新冠疫情蔓延、美国执意遏制中国、与中国“脱钩”的

新形势下，确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格局推动开放投资进入新阶段，力图“于危机中谋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3]。

七、几点启示

七十多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理念的演变，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创新的历程，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其中的哲理既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能够对未来有所启迪。

(一) 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决定了肯定是相对的，否定是绝对的

否定与肯定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当肯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时，事物保持现有的性质、特征和倾向，当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时，事物的性质、特征和趋势就发生变化，旧事物就转化为新事物。在70年的投资历程中，党和国家对投资的主导、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是肯定的一面，但其中投资主体、结构、机制、方式等在不断变化。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肯定了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本质；在量变到质变的演进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既是对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化与否定，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在新高度上的肯定与守恒。

转化与否定过程虽然有思想变化的因素，主要还是在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作用下，思想理念与时俱进，提倡“求变思维”的结果。

客观环境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否定与变革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适应环境变化的科学发现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产生深刻的革命。然而变革具有阶段性，新一阶段条件尚未成熟，旧的机制尚能维持与发展生产力时，也需要肯定，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历史问题的研究既要围绕不变的东西来理解与解释，也要研究否定之否定的变化，在变中理解不变，在不变中理解变，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实际^[14]。

中国哲学具有“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的特点，毛泽东继承与发展中国哲学的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他强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建设

一个新世界。于是形成了中国经济建设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二) 否定之否定是旧方式的扬弃, 新起点上创新

否定是对旧事物的否定, 但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 而是变革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 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 同时它自身也被后一阶段再否定。否定之否定并非等同简单轮回到原点。经过否定之否定, 事物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 在更高的阶段上重复旧的阶段的某些特征, 由此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事物发展的曲折与复杂。

形势在不断变化, 认识必须随之变化。每一次变化的背景都是新的起点, 否定以往就是在新起点上的创新, 否定之否定不是回到过去, 而是上了个台阶, 尽管楼梯可能是螺旋型攀升的。

(三) 把握改革方向, 坚定改革志向, 在突破旧格局中开辟新天地

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恩格斯指出: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 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向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15](p484)}

当前, 我们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 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6](p285)} 当前, 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 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 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揭示新特点新规律, 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7]

在新的形势下, 回顾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七十年间具有丰富内涵理念的变迁, 回顾所走过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前进路径, 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方向, 坚定改革志向, 发挥自身优势和条件,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突破旧格局中开辟新天地,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努力向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迈进。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2] 叶剑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79-09-30.
- [3] 王一鸣. 中国的绿色转型: 进程和展望[J]. 中国经济报告, 2019(06).
- [4] 王雅洁. 国调基金新布局[N]. 经济观察报, 2020-08-15.
- [5] 王雨箫, 阳娜. 商务部新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15家[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09/25/c_1126537840.htm, 2020-09-25.
- [6] 证监会: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建设[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7/16/c_1126246004.htm, 2020-07-16.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3.
- [8] 债转股的关键时刻[OL]. 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2018/0627/331132.shtml>, 2018-06-27.
- [9] 林小昭. 中国粮食地图: 黑豫鲁位居前三 “北粮南运” 趋势明显[OL]. 第一财经, <https://www.yicai.com/news/100736313.html>, 2020-08-25.
- [10] 施芝鸿. 打好打赢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N]. 人民日报, 2020-07-08.
- [11] 突破“禁区”, 为四个现代化大干贸易[N]. 经济导报, 1978-12-20.
- [12] 陈云文集(第3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13] 史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与重点任务[N]. 经济日报, 2020-08-19.
- [14] 胡铁球. 王家范老师闲谈中的史观[OL]. 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renmin_prom.jsp?Contid=8573118&from=renmin, 2020-08-05.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7] 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 求是, 2020(16).

责任编辑 杜亦欣